

后危机时代拉美地区区域 经济一体化形势与展望*

张 勇

拉美地区具有倡导一体化的历史传统。然而，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2017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贸易、投资、货币和发展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发生新变局，即出现了拉美地区原有一体化的被动调整和新增一体化的主动拓展这两种趋势。尽管内生动力仍是驱动经济一体化的主因，但是一体化速度和方向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中期内，加强拉美地区内部经济一体化程度和面向亚太的跨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比较大的潜力，而旨在促进生产结构转型和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结构性改革则是其重要保障。中国应抓住机遇，积极对接拉美地区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求。

关键词：拉美地区 经济一体化 区域合作 贸易保护主义

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可通过增加市场准入、享受规模收益、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增加对潜在投资者的吸引力、对内促进市场竞争、对外提高国际谈判能力等方式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简称拉美地区）长期以来具有倡导一体化的历史传统。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区域贸易协定就在拉美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近70年之后，该地区依然没有达到像欧洲那样的一体化程度，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拉美地区区域经济

张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Email: yongzhang0424@163.com。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创新项目“拉美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潜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一体化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繁荣发展,演变到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深受国际环境变化影响的状况。2017年以来,特别是进入2018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经历深刻的变革和调整,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对世界贸易、投资、货币和发展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驱动力和实现路径迎来新一轮的变化,机遇和挑战相伴而生。

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演变及历史阶段

(一) 相关文献回顾及评价

对于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一体化与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等的关系上,与其他区域一体化模式的比较也备受关注。大量研究文献表明,贸易一体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弗兰克尔和罗默的一项开创性贡献发现,依据地理划分的贸易对各国的收入具有积极影响。^[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报告也表明,贸易一体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会对总收入不平等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拉美地区的贸易开放度低于其他新兴市场,该地区有机会利用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贸易一体化可能导致社会特定部门的调整成本,因此构建社会安全网有助于平滑调整过程。^[2]

为实现利用区域一体化促进增长的目标,拉美地区已经探索了一些一体化模式:从盛行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旧”区域主义(强调区域一体化和进口替代作为工业化战略的组成部分)到20世纪90年代从实行外向型改革中衍生出的“新”区域主义。重要的是,后者因将区域主义视为实现全球一体化目标的基石

[1] 尽管这个结论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是一些最近的论文发现贸易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多拉尔和克雷(Dollar and Kraay, 2004)、洛艾萨和法尼柏(Loayza and Fajnzylber, 2005)、托雷等人(De la Torre et al., 2015)。J. A. Frankel and D. Romer, “Does Trade Cause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3), 1999; D. Dollar and A. Kraay, “Trade, Growth and Poverty”, *The Economic Journal*, 113(493), 2004; N. Loayza and P. Fajnzylber,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tylized Facts, Explanations, and Forecasts”, World Bank, 2005; A. De la Torre, T. Didier, A. Ize, D. Lederman and S. Schmukler, “Latin America and the Rising South, Changing World, Changing Priorities”, World Bank, 2015. 转引自IMF, “Cluster Report: Trade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MF Country Report No. 17/66, 2017, p. 21.

[2] IMF, “Cluster Report: Trade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MF Country Report No. 17/66, 2017, p. 21.

而获得“开放区域主义”的标签。^[1]德夫林和焦尔达诺也指出了“旧”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之间的区别。前者本质上涉及进口替代方法，谈判议程以贸易问题和逐步给予的优惠为中心。相比之下，“新”区域主义更具有雄心，其谈判议程更为广泛，包括争端解决机制、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标准，等等。^[2]

1993年联合国拉美经委会（CEPAL）的开创性研究及后续研究开始比较东亚和拉美地区不同的一体化模式。^[3]这些研究表明，一体化过程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情况是，首先建立促进一体化或“法律上”一体化的制度（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多边关税同盟和多边自由贸易区协定），然后推动一体化实质性发展（特别是扩大区域内贸易以及相伴而生的投资）。另一种情况是，即使没有建立制度，区域内贸易也会因市场主导型或“事实上”的一体化而自动扩大。桑山认为，一旦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体化之间产生互补性和协同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便水到渠成。^[4]

自1990年以来拉美经委会一直倡导兼顾社会公平的生产模式变革战略（transformación productiva con equidad），并且认为一体化必须建立在开放的区域主义基础上，同时也必须有助于改变生产模式。1994年，拉美经委会明确强调产业内专业化会导致结构转型，而产业内专业化又是由区域一体化驱动的。^[5]这种理念不仅影响了拉美经委会后续的研究，而且以此为基础广泛地改变了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前景。

[1] Bown, Chad P., Daniel Lederman, Samuel Pienknagura and Raymond Robertson, “Better Neighbors: Toward a Renew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17, p. 2.

[2] R., Devlin and P. Giordano, “The Old and New Regionalism: Benefits, Cos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TAA”, In Estevadeordal, A. D. Rodrik, A. M. Taylor and A. Velasco(eds), *Integrating the Americas FTAA and Beyo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转引自 Renato Baumann,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Trends and Challenges”, CEPAL, LC/BRS/R.190, January 2008, p. 13.

[3] Mikio, Kuwayama, “Regionalización abierta de América Latina para su adecuada inserción internacional”, Documento de trabajo (No.20), ECLAC, 1993; ECLAC, “Open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 Contribution to Changing Patterns with Social Equity”, 1994; Ramiro, Pizarro,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Asia-Pacific”, ECLAC-International Trade Series No. 6, 1999; Mikio, Kuwayama, “Open Regionalism in Asia Pacific and Latin America: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ECLAC-International Trade Series No. 4, 1999.

[4] Mikio, Kuwayama, “Regionalización abierta de América Latina para su adecuada inserción internacional”, Documento de trabajo (No.20), ECLAC, 1993. 转引自 Akio Hosono, “Asia-Pacific and Latin America: Dynamic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CLAC - International Trade Series No. 132, June 2017, p. 9.

[5] ECLAC, “Open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 Contribution to Changing Patterns with Social Equity”, 1994.

简言之，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呈现的三个特征将奠定分析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演变动因及路径的基础。第一，经验表明，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国家经济增长。这将增加各国应对内生性或外源性冲击时通过一体化摆脱危机的可能性。第二，开放型区域主义十分重要，但面临较大挑战。一方面从议题设置需求看，从简单处理贸易问题演进到将竞争政策、劳工标准、环境问题等不与贸易直接相关的问题纳入，增加了设计一体化战略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当区域一体化组织内部成员存在显著差异以及国际贸易投资环境恶化时，推进一体化的难度增加。第三，随着全球生产过程“片段化”趋势加强，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已经演变成各国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由市场引领的、自发的、先于“法律上”的经济一体化具有更大的活力和可持续性。

（二）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历史发展特征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创建共同市场来加速工业化为特征（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拉美经委会就已经提出建议，即通过扩大国内市场来获取更大规模的生产收益，从而促进地区工业化。较早的实践者是于1960年成立的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和拉美自由贸易协会（LAFTA）。^[1]20世纪50、60年代拉美地区正面临国际收支长期失衡、进口替代工业化所需的进口资本品不足以及国内市场狭小等困扰，这增强了区域一体化的主观需求，从而迎来了一体化的第一个高潮。然而，整个70年代，鉴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支付受限、军政府执政的国家很难让渡国家主权等因素，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陷入低潮。

第二阶段以外向发展模式促进开放区域主义为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加上债务危机，使拉美地区大多数国家出现了外汇短缺。贸易下降，加之不同国家闲置产能和过度需求并存，导致区域一体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新获得动力。在这个时期，区域一体化不仅被视为扩大国内市场、享受规模收益的一种手段，而且被证明是摆脱经济危机的一种途径，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结构改革中被视为转换生产结构、提高竞争力的工具。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迎来第二个

[1] 中美洲共同市场是中美洲5国组成的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其宗旨是促进中美洲的经济一体化，协调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逐步取消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统一对外关税，最终实现地区贸易自由化，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拉美自由贸易协会是1980年成立的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LAIA）的前身，而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的长期目标是通过关税优惠和签订区域协定来逐步建立一个拉丁美洲共同市场。

高潮，代表性进展包括1991年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成立，同年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成立并取代中美洲国家组织。1994年加勒比国家联盟（ACS）成立，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式生效^[1]，1996年安第斯集团更名为安第斯共同体并于1997年正式运作。然而，这种开放的区域主义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拉美地区连续爆发的三场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动荡与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而陷入低潮。

在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比较中发现，虽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拉美地区一体化比东亚地区至少早30年并且建立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但遗憾的是拉美地区内贸易增长不及预期，反而东亚一体化自90年代中期启动后却获得了显著成绩。东亚一体化的成绩主要归功于自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长达20多年的由市场主导的、“事实上”的经济一体化为向制度主导的、“法律上”的经济一体化转换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2008年的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所强调的，亚洲区域主义是经济互动扩大的结果，而不是政治规划的结果。^[2]

第三阶段以全球金融危机加速国际政治经济深度调整为特征（2008年至2017年）。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地缘政治因素错综交织，地区冲突和动荡此起彼伏，大国政党博弈消耗改革动力，使全球经济复苏面临脆弱性的问题。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上升，改变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三是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异成为新型国际分工的动力，借此形成的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重塑了国际经济新格局。四是以工业4.0、新能源、大数据、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孕育兴起，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找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新引擎。在这种背景下，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迎来第三个高潮期，代表性进展包括2008年南美12国成立南美国家联盟（UNASUR）、2011年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CELAC）正式成立、2012年太平洋联盟（AP）正式成立，等等。

第四阶段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重塑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为特征（2017年至今）。2018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贸易、投

[1] 2018年11月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以取代NAFTA。

[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merging Asia Regionalism: A Partnership for Shared Prosperity*, Manila: ADB, 2008. 转引自 Akio, Hosono, *Asia-Pacific and Latin America: Dynamic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CLAC-International Trade Series No. 132, June 2017, p.17。

资、货币和发展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发生新变局。区别于前三个阶段，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外溢效应造成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原有一体化的被动调整，如NAFTA的重新谈判；二是新增一体化的主动拓展，如地区内部一体化程度加深及与域外欧盟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积极融合。下文将详细阐述这两种方向的演变。

后危机时代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逻辑

2008—2009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此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入深度变革和调整的后危机时代。特别是，2017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了显著冲击。因此，后危机时代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更多地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本文将集中阐述后危机时代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逻辑呈现的新特征，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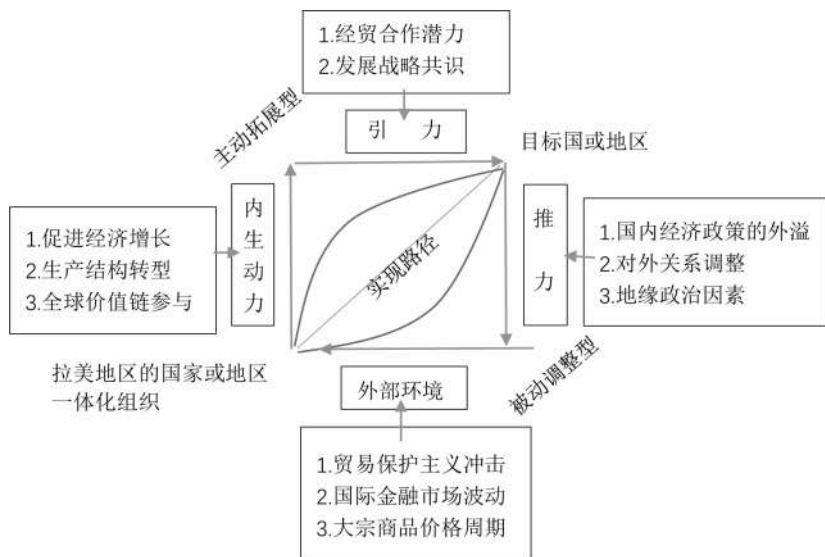


图1 后危机时代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因与路径演变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制。

首先，从拉美地区角度看，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受内生动力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内生动力主要体现在与经济一体化相关的三种需求上。一是促进经济增长。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过2010年短暂的反弹，拉美地区经济自2011年起进

入下跌周期。尽管2017年和2018年拉美地区经济触底反弹，结束了自2011年以来6年经济下滑的趋势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区经济首次连续两年的衰退（2015年和2016年分别衰退0.2%和1%）^[1]，但是，从长期而言其潜在增长率是下降的。因此，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拉美地区面临的巨大挑战。二是生产结构转型需求。拉美地区经济在产业结构层面上的失衡表现为初级产品专业化和“去工业化”趋势并存。前者不利于技术升级和进步，进而会加深去工业化的程度，而后者则是拉美地区丧失国际竞争力的根源之一。三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需求。基于可获得的数据，研究发现至今拉美地区整体上融入北美、欧盟和东亚这三条主要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都有限。以中间产品贸易^[2]衡量，拉美地区既不是全球价值链中非初级中间产品的重要供应商，也不是从处于这些价值链中的国家进口中间产品的重要进口商。

从外部环境看，后危机时代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展面临三重压力。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持续释放负面冲击。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引起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中美已经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是就美国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而言，已经损害了全球产业链和贸易流，进而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比发达国家更严重。^[3]二是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一方面，鉴于全球经济增长开始分化，各国央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成本和难度加大。另一方面，贸易紧张关系升级也间接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增加，新兴市场受此影响较为严重。许多新兴经济体经历了国际市场融资成本的增加以及它们的货币对美元的大幅贬值。三是大宗商品价格处于下跌周期。后危机时代，尽管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内有所反弹，但低于危机前水平，从中长期角度看仍处于下跌周期。因此，这将恶化资源出口型国家的贸易条件，从而削弱净出口对增长的拉动。

其次，从目标国或地区看，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方向选择上面临两种不同力量。具有引力的目标国或地区，通常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稳定的经济增长和高水平的开放意愿，其与拉美地区的经贸合作存在较大潜力且在发展战略上具有较多共识。以中国与拉美地区的经贸合作为例。1984—2000年中拉贸易年均增长率

[1] CEPAL,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8*, Santiago, 2019, p.107.

[2] 中间产品贸易通常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指标。

[3]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18, p. 36.

为13.5%，而2000—2018年中拉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19.4%，特别是2000—2011年中拉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30.8%。^[1]这种跨越式增长无疑会增加中国对拉美地区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吸引力。相对而言，具有推力的目标国或地区，或因国内经济政策具有外溢效应，或因政府调整对外关系，或因地缘政治因素，有可能对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阻碍。例如，传统上被视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地区不同程度经历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冲击波”。依据与美国的地理距离，墨西哥无疑首当其冲。涉及墨西哥的政策主要包括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并要求墨西哥买单、重新谈判NAFTA、遣返在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等。鉴于与美国的联系较弱且外交冲突较少，南美洲国家更多的是受特朗普政府政策对全球经济外溢效应的影响，特别是面临加息、缩表和减税三重叠加效应的挑战。而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是拉美地区最脆弱的两个次区域地区，特别是在贸易、侨汇和移民方面深受美国影响。

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的实现路径可能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因目标国或地区的推力和外部环境形成的压力导致拉美地区出现“存量”一体化的被动调整。另一种是，因内生动力与目标国或地区的引力高度契合形成拉美地区“增量”一体化的主动拓展。换言之，存量一体化的被动调整，体现了北向的冲击（美国），而增量一体化的三个方向，恰恰体现了内向、东向（欧盟）和西向（亚太）的主动拓展。

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新变化及挑战

（一）“存量”一体化的被动调整

这种趋势的典型代表包括美国、墨西哥、加拿大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巴西博索纳罗政府对外关系调整的外溢效应以及委内瑞拉危机导致的少数一体化组织陷入分化。

1.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2018年11月30日，美墨加三国贸易部长在阿根廷举行的G20峰会期间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以下简称《美墨加协定》），标志着北美地区持

[1] 作者根据CEIC数据库计算。

续的贸易紧张关系得以缓解。该协定共计 35 章，涵盖关税、农业、原产地原则、纺织品、海关与贸易便利化、投资、电信、金融服务、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劳工、环境、中小企业、反腐等诸多内容。^[1]它保留了原协议的主要框架，并对部分章节做了补充和调整，调整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原产地原则、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和劳工等条款中。

尽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称，该协议最终确定并实施后，将创造更加平衡、互惠的贸易，为美国人提供高薪就业机会，并促进北美经济增长，但是，来自美国民主党和劳工组织的阻力曾一度让该协定面临失败的威胁。重掌众议院的民主党批评执行该协定中劳工和环境标准的能力问题，并警告协定关于汽车一章的最新最低工资规定——必须有 40%~45% 的汽车零部件由时薪 16 美元或以上的工人生产——不足以阻止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向墨西哥。因此，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始终坚持，只有对劳工和环境保护执行条款进行重大修订，才能对此进行表决。这直接导致该协定在美国拖延一年有余，并最终促使三国在 2019 年 12 月 10 日签署了《美墨加协定（修订版）》。修订后的《美墨加协定》包括更严格地落实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的条款。

新协定需要三国立法机构的批准才能正式生效。墨西哥参议院在 2019 年 12 月 12 日已经率先批准该协定。美国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和 2020 年 1 月 16 日通过修订后的《美墨加协定》，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于 2020 年 1 月 29 日正式签署这一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议会也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批准该协定。然而，新协定在未来生效后的落实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关于协议细节的相关争议仍然存在。例如，墨西哥企业界对新协议中的劳工合规性核实机制提出质疑。二是新协定对各方的影响尚待评估。新协定包括了对汽车、纺织品、化学品等部门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更有利于美国更大程度地介入北美价值链。然而，对美国而言，消费成本变化以及生产转移的影响尚待评估。对墨西哥而言，不确定性犹在。例如，新协议可能阻碍一些制造业的增长，以及尚不清楚墨西哥工资是否真的会因为新协定而增加。

2. 南方共同市场规则可能面临重新“改写”

巴西右翼候任总统博索纳罗已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就职，他可能会改变劳工党治下近 15 年的外交政策。劳工党政府倾向于通过意识形态结盟联合拉美地

[1] 熊洁、万容：“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美墨加三国协定”，《学习时报》，http://www.qstheory.cn/international/2018-10/29/c_1123628660.htm[2019-07-30]。

区左翼政府，并寻求通过“南南合作”获得地缘政治地位。而博索纳罗政府在地区内部倾向于加强与中右翼和右翼政府的合作，对外更愿意回归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紧密的双边关系而不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签署多边的区域贸易协定。例如，明显的征兆是2019年3月博索纳罗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支持巴西成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并使巴西成为非北约的主要盟友。因此，南方共同市场（以下简称南共市）在巴西新政府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有可能下降。而且，巴西想要通过与发达国家签署双边自贸协定来促进贸易自由化，势必将突破南共市关于新协定必须由成员国一致同意的规定，届时其规则可能被“改写”，这也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3. 委内瑞拉危机造成少数一体化组织分化

一方面，委内瑞拉目前所处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其推动次区域一体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拉美地区政局的“钟摆效应”再度显现——“左退右进”趋势正在加强。这给美国利用委内瑞拉危机分化拉美地区团结提供了契机。换言之，在对待委内瑞拉危机等问题上，拉美地区的国家明显分成两大阵营，以利马集团为代表的十多个国家追随美国、承认并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瓜伊多，而古巴、玻利维亚、尼加拉瓜、乌拉圭、墨西哥等国家仍承认马杜罗政权。鉴于此，2011年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且，2019年3月22日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巴拉圭和秘鲁等国家签署声明，宣布创立南美进步论坛（PROSUR），以取代南美洲国家联盟，这意味着后者实质上已经解体。因此，地缘政治因素成为拉美地区次区域一体化整合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增量”一体化的主动拓展

1. 太平洋联盟和南共市主动融合

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外溢效应间接推动拉美地区两大次区域组织——太平洋联盟（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和南共市（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开始“亲密接触”。2018年7月24日太平洋联盟和南共市在墨西哥巴亚尔塔港首次举办联合峰会，签署共同宣言和行动计划，承诺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地区一体化。数据显示，两大组织8个国家代表着一个4.3万亿美元的市场，占拉美地区人口和GDP的比例均为80%，占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比例接近90%，占该地区贸易的85%。^[1]然而，鉴于产业结构趋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1] EIU, *Country Report Chile*, August 2018, p.31.

营商环境不完善等原因，拉美地区区域内贸易一体化水平较低。

联合国贸发会数据显示，2018年拉美地区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16%，远低于欧盟（63.6%）和亚洲（53.7%）区域内出口比例，与非洲地区水平（15.9%）大体相当（表1）。拉美地区实践表明，区域内贸易多元化程度及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集中度都高于区域外，而且区域内贸易有利于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进而创造就业。因此，两者融合并最终建立一个单一自由贸易区对促进拉美地区区域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表1 2018年拉美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区域内外贸易情况比较（亿美元；%）

	出口				进口			
	区域内		区域外		区域内		区域外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非洲	773.1	15.9	4100.5	84.1	736.4	13.3	4800.8	86.7
亚洲	37947.4	53.7	32679.6	46.3	35660.5	54.2	30150.4	45.8
拉美地区	1733.5	16.0	9109.8	84.0	1791.5	16.2	9245.4	83.8
欧盟	40933.0	63.6	23401.2	36.4	37477.8	58.8	26303.3	41.2

注：金额为现价美元计算；“亚洲”仅指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UNCTADSTAT）整理计算，[http://unctadstat.unctad.org/wds/\[2019-12-06\]](http://unctadstat.unctad.org/wds/[2019-12-06])。

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并非易事。首先是新政府的政治阻碍。经过2018年的大选，哥伦比亚、巴拉圭、墨西哥和巴西候任总统相继上台执政，加上2019年10月举行大选的阿根廷，两大次区域组织中有5国都将迎来新政府的贸易政策，前任政府达成的共识可能无法延续。其次是两大国的贸易优先选项不同。墨西哥新当选的左翼总统洛佩斯过去并不热衷于自由贸易，而当选后贸易政策的首要挑战是处理与其重要贸易伙伴美国和加拿大签署的《美墨加协定》相关问题。而巴西右翼总统博索纳罗已经释放出重视与发达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而非区域贸易协定的信号。更重要的是，巴西和墨西哥两国的贸易规模很小，缺乏深度一体化的内生动力。最后是各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抵制。每个政府都可能面临来自国内利益集团的激烈游说，即要求征收关税等保护措施以维持其垄断利润。

2. 南共市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历经20年的漫长谈判，南共市和欧盟终于在2019年6月就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该协定涵盖政府采购、贸易便利化等多领域内容。曾经阻碍谈判进

程的核心争议——农业以及汽车工业等问题，以相互妥协告终。^[1]双方能在自贸协定上取得重大突破主要归因于如下方面。其一，全球金融危机对欧盟的冲击强于美国，欧盟需要重启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战略，而加强与南共市的贸易关系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抓手，因为欧盟与南共市历史上具有传统的紧密的经贸关系。例如，2017年南共市占拉美地区向欧盟出口的46%，占拉美地区从欧盟进口的36%（图2）。其二，世贸组织多边谈判陷入僵局给跨地区的双边谈判提供了机遇，同时，欧盟试图通过构建贸易协定网络以抵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引致的负外部性。随着欧盟与加拿大和日本的自贸协议分别于2017年9月、2019年2月生效，加之与南共市的协议签署，即使在全球贸易体系受到冲击、英国脱欧使欧洲一体化遭遇挫折的情况下，欧盟仍能在基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享有优惠市场准入。其三，从长期来看，欧盟试图凭借此协议在与南共市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拉美地区市场竞争中抢得先机。数据显示，作为南共市前两大贸易伙伴，中国和欧盟在2018年与南共市的贸易额分别为1049亿欧元和876亿欧元。^[2]其四，巴西和阿根廷的右翼亲市场政府与欧盟达成协议的意愿较强，因为其将该协议视为推进结构性改革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协议赶在2019年10月欧盟委员会主席换届与2019年10月阿根廷大选之前完成，显示出政治机会窗口的重要性。^[3]

然而，目前该协定还有待缔约各国国会批准才能生效。从欧盟方面而言，预计内部将因利益集团的阻碍而经历漫长的批准过程。最大的阻碍来自爱尔兰和法国的农业生产利益集团。目前法国面临政府推动法国和欧盟农业政策改革以及具有争议性的财政和福利改革带来的双重压力，中短期内不太可能不顾农业生产者

[1] 根据协定，欧盟将放开95%的产品，占其从南共市进口产品的92%。南共市将全面放开91%的产品，覆盖从欧盟进口的91%。对南共市国家而言，欧盟重要的让步包括取消对诸如橙汁、速溶咖啡和水果等商品的关税，并通过关税配额增加和提高对牛肉、家禽、猪肉、糖、乙醇等产品的市场准入机会。而欧盟将在南共市国家获得更多的先前遭遇高关税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据欧盟预计，该项协议为欧盟公司每年节省的关税将超过40亿欧元，比欧盟和加拿大、日本签署的自贸协定节省的关税都高，后者分别约为6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 “EU and Mercosur Reach Agreement on Trade”,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039&title=EU-and-Mercosur-reach-agreement-on-trade>[2019-12-06]。

[2] Anabel, González, “The EU-Mercosur Trade Accord Sends a Signal to the World’s Protectionists”,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eu-mercotur-trade-accord-sends-signal-worlds-protectionists>[2019-12-06]。

[3] 在2019年10月阿根廷大选中，中左翼总统候选人费尔南德斯当选总统，这使南共市和欧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诉求而轻易批准该协议。此外，对环境恶化的担忧也是重要因素。2019年巴西亚马孙地区森林砍伐和火灾的急剧增加，引发了一场关于巴西政府环境保护不力的国际形象危机，从而不利于欧盟国家推进协议批准的进程。从南共市方面而言，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同样面临挑战。2019年10月27日，阿根廷中左翼总统候选人费尔南德斯赢得大选。他在竞选期间曾认为该协议违背了阿根廷的工业利益并公开表示反对。倘若就任后他继续坚持这种立场，那么，该协议的命运可能面临“夭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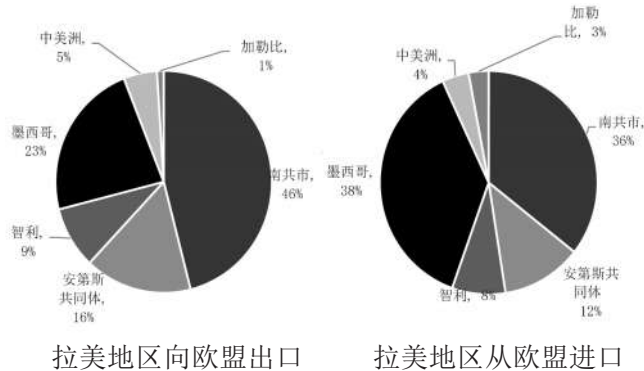


图2 拉美地区与欧盟货物贸易构成情况（2017年）

资料来源：CEPAL, *The European Union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onvergent and Sustainable Strategies in the Current Global Environment* (LC/TS.2018/56/Rev.1), Santiago, 2018, p.86.

3. 拉美地区的国家面向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加速

面向亚太地区的跨区域一体化的吸引力更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拉美地区的国家积极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太平洋联盟从创建之初就强调与亚洲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同时相较于南共市，其在双边协定交易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在由11个国家共同签署的CPTPP中其巩固地位的愿望十分强烈。例如，墨西哥是11个成员国中首个经过国会批准该协定的国家。该协定已经于2018年底正式生效。其二，太平洋联盟正在推动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自贸协议谈判。其三，充分利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合作机制的优势。随着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上升，APEC成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其不仅推动了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而且为促进全球和地区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拉美地区的APEC成员，智利、墨西哥和秘鲁均积极寻求与该组织其他经济体的经济一体化，以此促进本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其四，中拉经贸合作步入转型升级新阶段。中国一贯坚

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赢得了拉美地区的国家的尊重和信任。

然而，拉美地区与东亚国家经济一体化面临结构性挑战。第一，从亚太地区看，拉美地区对于亚太贸易的重要性弱于亚太对于拉美地区，双方贸易关系呈现不对称性。第二，从来源地和目的地看，拉美地区对于亚太地区的出口高度集中，而亚太对拉美地区的出口也高度集中。第三，亚太和拉美地区的贸易结构通常是产业间贸易模式，这种贸易结构不利于升级贸易和投资关系。第四，拉美地区出口到亚洲的产品多元化程度低于出口到美国、欧盟和拉美地区内部。

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展望及中国的机遇

基于上述分析，中短期内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将呈现新特征。尽管内生动力仍是驱动经济一体化的主因，但是一体化速度和方向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升级、欧盟因英国脱欧问题遭遇一体化挫折的情况下，加强地区内部经济一体化程度和面向亚太的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成为现实的路径选择，而旨在促进生产结构转型和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结构性改革则是其重要保障。中国应抓住这种机遇，积极主动对接拉美地区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需求。

（一）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及特征

首先，从影响因素看，尽管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参与全球价值链是经济一体化源动力，但是后危机时代一体化的速度和方向将更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中短期内，影响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的外溢效应和新兴市场集体性崛起产生的市场增量。就前者而言，美国通过升级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了全球贸易紧张局势，进而冲击全球供应链、引发全球技术紧张局势，与此同时，通过“退群”“毁约”等方式造成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从而对全球经济治理造成严重冲击，这些推力将加速拉美地区一体化方向的转移效应。就后者而言，新兴市场集体性崛起通过中等收入阶层有效需求扩大培育了巨大的市场增量，从而为形成巨型跨区域经济协定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拉美地区新一轮大选周期不仅重塑了本地区“左退右进”的政治格局^[1]，而且可能导致新政府调整贸易投资政策，从而改变

[1] 2017—2019年拉美地区进入超级大选周期，包括主要大国在内的16个拉美地区的国家举行换届选举。

一体化格局。

其次，从方向选择看，拉美地区区域内一体化和面向亚太的经济一体化更具有潜力。就区域内一体化而言，拉美地区经验表明，区域内贸易多元化程度高于区域外，而且区域内贸易更有利于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拉美经委会倡导通过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以及金融一体化三种方式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实现“以平等为目标的结构变革战略”。就面向亚太而言，CPTPP、APEC以及未来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都有可能成为拉美地区跨区域一体化的助力平台。例如，APEC近年关注的服务和数字经济、区域性互联互通等议题，也契合当前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求。

最后，从实质内容看，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是基于经济结构互补和共享基础设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这客观上需要结构性改革作为后盾。就经济结构而言，鉴于拉美地区资源禀赋优势以及内部生产结构趋同，拉美地区尚未形成类似欧盟、亚洲内部的产业链形式。例如，南美洲国家大多以自然资源产业为重点，墨西哥、中美洲国家以面向美国的客户工业为中心，两种类型内部及彼此之间均缺乏产业联系。研究表明，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落后于东亚地区的重要原因在于拉美地区产业结构转型滞后，而东亚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成功处理了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产业转型或复杂化是指经济结构由以低生产率部门为主向以高生产率部门为中心的结构转变。实现这种转变的方式包括创造高生产率的新产业、提高现有产业的生产率、促进产业多元化、扩大和深化价值链，等等。^[1]就基础设施而言，具有完善物流和基础设施的本地供应商对全球生产布局的跨国公司更具有吸引力，而且对远距离国家而言，作为抵消距离因素负面影响的手段，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要高于邻国。然而，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拉美地区基础设施的落后程度是明显的。因此，拉美地区的国家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产业升级不足和基础设施匮乏两大发展瓶颈，从而促进深度经济一体化。

（二）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政策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可能成为拉美地区跨区域增量一体化方向的一个重要选择。面对这种历史机遇，中国应该秉承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以结构性改革提升中拉经贸合作质量为核心、以构建多层次开放网络为支撑、以

[1] Akio, Hosono, *Asia-Pacific and Latin America: Dynamic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CLAC - International Trade Series No. 132, June 2017, p. 11.

“一带一路”建设促价值链融合为抓手，积极主动对接拉美地区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求。

首先，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中拉经贸合作提质增效，这是核心动力。当前中国进入经济中速增长的“新常态”，正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纠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现象以提高潜在增长率。从需求看，中国正转向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拉动；从供给看，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服务业比重等举措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中国的消费升级、产业优化及促进对外投资将为拉美地区提供增量市场。

其次，通过全方位开放构建多层次一体化网络，这是基础支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 APEC 赋予的多边协调机制，坚持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二是积极与拉美地区次区域组织（如太平洋联盟和南共市）接触和对话，增加南南合作的次区域层次；三是继续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推动整体合作和双边合作并行互促。目前，除与智利、哥斯达黎加和秘鲁的自贸协定外，中国与巴拿马的自贸协定谈判已经进行了五轮，而与哥伦比亚的正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未来可继续推动与更多拉美地区的国家商签自贸协定。

最后，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价值链融合，这是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这个国际合作新平台不仅是中国新时代统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而且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拉美经委会一直提倡加快区域一体化有助于实现“以平等为目标的结构变革战略”。而“一带一路”倡议恰好能够满足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重组价值链以及共享基础设施）和金融一体化三方面的需求，因此中拉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责任编辑：邱静）

Self-percep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How to Integrat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Ouyang Xiangying and Fang Xiaohui

58

Self-percep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seem t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Russia's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but since they are the in-depth factors defin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ientation of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hey can influence the depth, scale and direction of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Self-perception concerns the question of "who I am" and Russia can be divided into Western, Slavic and Eurasian groups. Development strategy concerns the issue of "how to do", which in reality can be translated into a choic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between "isolation and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has never seemed to clearly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who I am" and "how to do it", reflecting the ideological barriers to its development. This obstacle exists invisibly among the Russian elite, especially intellectuals, thus creating ideological contradictions and divides.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the group of new Eurasiaism had the upper hand like never before, but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and Slavic groups remains significant, leading to some members of the Russian elite being wary of the eastward strategy, to some extent preventing integration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Russia's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strategy. The substantial deepening of the "Belt Alliance" integration depends on prevention of the Russian elite from further accepting the extremist tendencies of new Eurasiaism and provision of broader and stronger support for Eurasian integration as a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Post-crisis Era

Zhang Yong

75

Latin America has a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advocating integration. Howev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 2009 has accelerated the deep-level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s. Since 2017, the unilateralism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had a tremendous bearing on global trade, investment, currency, and development system, leading to new changes in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Currently, there are two trends in the region: the passive adjustment of the region's previous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the active expansion of the new integration process. Although endogenous power is still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speed and direction of integration have increasingly been subject to influence of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medium term, Latin America may have great potential to strengthen the degree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in the region and cross-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iented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tructural reforms which aim at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structure and upgrading alo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re important guarantees for that potential to materialize. Chin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actively cater to the cross-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Latin America.

Integration of Finance and Technology: Definition, Determinants and Risks

Li Guangzi

91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gration of fina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deepened. Compared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in practice and policy area,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Fintech is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In this article, we define Fintech based on a “Three Division Method”.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Fintech and analyzes its driving factors, while discussing the special background for Fintech development in China. Lastl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risks of Fintech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discusses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This research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the definition, determinants and risks of Fintech.

Trade Barriers Caused by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vestigations: Stylized Facts, Impacts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Dai Zhongqiang

107

In recent years, the US has frequently launch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investigations on other countries to protect its domestic market from “unfair act alleged”.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re exist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owth rate of US trade deficit and the number of IP investigations. Most of the cases about IP investigations in the US finally fail to prove defendants’ infringements; therefore, IP investigations that are alleged to safeguard “fair trade” have in fact been dissimilated into a kind of trade barriers. IP investigations will deeply influence litigants and stakeholders through trade inhibition effect, trade deflection effe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ffect, global value chain effect and industrial correlation effe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ue to the unequal status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of concerned parties, IP investigations will become the hardest nut to crack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going abroad. Strengthening its own IP protection and filing more patents in the US will not help reduce the number of IP investigations against them. Consequentl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